

[英] 彼得·赖特 著

郝啟成 王彦彬
倪春燕 游 杰

The Candid Autobiography of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er

抓间谍的



抓间谍的人

一位资格最老的谍报官员
的 坦 诚 自 传

彼得·赖特 著

保罗·格林格拉斯协助整理

郝啟成 王彦彬

译

倪春燕 游 杰

吉林文史出版社

抓间谍的人

ZHUA JIANDIE DE REN

责任编辑：宋一夫

封面设计 张亚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15.75印张2插页354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农业厅印刷厂装订

印数：1—32000册

定价：3.1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038-X/I·9

献给贤妻洛伊丝

译者前言

DB27/66

《抓间谍的人》是英国情报界资深官员彼得·赖特的自传。

彼得·赖特生于1916年，小时曾患小儿麻痹症，并有严重的口吃。但他天资聪敏，刻苦好学。他父亲搞了40多年的情报工作。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迷上了技术和情报工作。他虽然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但终于自学成材，先在英国皇家海军科学署的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从事探测潜艇的雷达研究。1949年被聘为英国情报界的兼职科学顾问。1955年参加英国保安局，成为该部门第一位专职科学家。1976年退休，随后移居澳大利亚。

英国的情报组织有三家：英国保安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和政府通讯总部。

英国保安局即过去的军事情报局五处，简称军情五处，代号为MI5，大致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保安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保护英国国内秘密不被外国间谍窃取，防止国内破坏、颠覆和失密。同时，也负责国外的反间谍工作。

英国秘密情报局即过去的军事情报局六处，简称军情六处，代号为 MI6，大致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搜集国外情报，招募间谍和提供其它战略服务。

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监听电话、截收外国电码、电报和无线电通讯以及进行密码破译。它与美国合作，在全球构成一个电子监听网。

英国保安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虽然早已是二个各自为政的大机关，但人们（包括本书作者）仍然习惯称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这个称呼在翻译中亦保留下来，所以，军情五处处长即是英国保安局局长，军情五处副局长即是英国保安局副局长；军情六处处长……亦然。请读者不要感到别扭。

英国的情报机构，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搞窃听、挖门撬锁、跟踪盯梢、扒窃诈骗、审讯诱供，而且还从事暗杀破坏活动。虽然他们的主要对手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局），但对友邦、对第三世界、对共产党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例如1960—1963年，截收过法国驻英使馆与戴高乐总统之间的全部密码电报。在外国首脑来访下榻的饭店以及某些国际会议会场，也装过窃听器。他们还策划过毒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剿杀塞浦路斯游击队领导人格里瓦斯。工党领袖威尔逊于1974年2月当选首相后，军情五处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提供的线索，便秘密调查威尔逊是不是“苏联特务”，阴谋搞垮工党政府。本国的情报部门竟然搞到本国首相和本国政府的头上。

彼得·赖特披露出英国情报界的大量内幕和秘密，这对于从事政治、历史、外交、情报、公安、安全等方面研究的人员无不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喜欢侦探惊险小说的人，也是一

本好书。但对于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问题，应当给予充分地注意。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张剑瑛、马凤兰、李长城、王玉祥、张湛、高洪弟、刘志江、田丁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鸣谢。

由于翻译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及同仁，不吝斧正。

前 言

多年来，我一直在猜想，上班的最后一天会是什么样呢？1976年1月，在英国保安局（即过去的军事情报局五处）的最上层供职20多年之后，重返真正世界生活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我最后一次从尤斯顿地铁车站走出来。冬日的太阳明光闪亮。我顺着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的方向走去。走了50码，拐进一座无名办公大楼的没有标牌的入口。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家医院的夹空中间挤着一幢不起眼的大楼，这就是英国反谍报机关的总部。

我向警惕地站在传达室的警察出示了出入证，走进运载资深官员到七楼内部保密室的、受特殊程序控制的电梯。我顺着走廊默默地来到我的办公室，隔壁就是局长的大套间办公室。

各个办公室都鸦雀无声。我可以听到远处下面运送通勤人员到伦敦西区上班的地铁的隆隆声。我开了门锁。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情报官员这一行的基本用具——一张写字台，两台电话，一台是防窃听的外线电话；旁边是一个大型的绿色

铁保险柜，正面带有一个特大号的组合锁。我把外衣挂起来，开始按部就班地干自己的事。那些退休的官员们在鸡尾酒会上削尖脑袋探听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的细枝末节的情景，我见的是太多了。我要跟这些事一刀两断，彻底解脱出来。我打定主意去澳大利亚养马，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生活。

我旋转锁上的号码，打开沉重的保险柜门。前面是一堆档案科的档案，上面都盖着“绝密”二字，档案后边是一叠小组合匣。档案，这些年来我调出的档案有几千份，而现在，这些是最后一批了。情报人员的例行报告按照惯例传给我，有计算机工作队的最新报告，有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实力的最新分析。档案里的问题都是要回答的，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了。苏联大使的档案是一个年轻工作人员送给我的。我认出他没有？说实在的，没有，这是一个双料间谍案子，断断续续地多年了。我有什么看法吗？说实在的，没有。当你的心在局里时，每个案子都各有不同；当你离开时，它们看来都一样。我小心地在这些档案上签了字，整理好，以便让我的秘书将它们送回档案科。

午饭后，我着手整理那些组合匣。从保险柜的里面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里面装着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机的详细技术资料——这是我50年代在军事情报局五处作为第一位科学家时所保留下来的残存部分。我将里面的东西整理一下，以便送给技术处。一小时以后，技术处长来谢我。他是相当摩登的政府科技官员——整洁、谨慎，孜孜以求地向钱看，我说：“那都是我保存的，零零散散的，”“恐怕对你也没什么大用处，现在都是卫星情报了，你说呢？”

“不能这么说，”他回答道，“我会拜读为快的。”他显得有点尴尬的样子。他和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来往。我

们出身于不同的社会。我是一个驯服工具般的即席演员，象胶水、火柴棍儿、橡皮筋一样，可以随时取用。而他却是一位堂堂的国防承包商。我们握了握手，我又回头整理保险柜。

剩下的匣子里装着我在1964年参加这个反谍报机关后所搜集的文件。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局内部搜查奸细最紧张的时候。那些手抄笔记和打字的辅助备忘录里充斥着四海传播的谍报情况——嫌疑犯名单和起诉、叛徒和判断的详细资料。在这些起因清楚而结尾神秘、无休无止的追猎文件中，穿插着我的所做所为的一些头绪。

最后，我的秘书走进来，交给我两本蓝皮笔记本。“您的日记。”她说。接着，我们一起将日记本撕碎，扔进我写字台旁的焚烧袋子。然后，到履行最后一道手续的时候了。

我来到机关办公处，值班人员交给我一个本夹子，里面是当时我手头的秘密文件登记表。我开始在登记表上核对、划勾儿。先交回了通信谍报和卫星谍报文件。然后，处理了我手中的那一大堆案例文件。对于个人来说，能得到秘密文件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待遇；而失去了这种待遇，在官场上来说，也是件痛心的事。每核销一笔，就把大门关上一点。只那么半个小时的功夫，我浪迹多年的秘密世界的大门便永远关闭了。

天快黑时，我叫了一辆的士向军情五处的旧总部——梅费尔区的莱肯菲尔德大厦驶去。整个机关正在向柯曾大街顶头的新办公楼搬迁。但是，职员酒吧，“猪与眼俱乐部”仍然留在莱肯菲尔德大厦，我的欢送宴会定在这里举行。

我走进旧楼。正是在这里的镶图案走廊里和嵌榻檐办公室中，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和布伦特进行了追猎。也是在这里，我们由于怀疑有暗藏的鼯鼠钻入保安局心脏而展

干了一场保安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秘密战争。我们的怀疑对象是保安局前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但最终仍是查无实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种指控始终是耿耿于怀。由于直觉、情绪和偏见的驱使，双方象中世纪的神学家那样长期不睦达十年之久。

在70年代，干将们接二连三地退休了。直到搬迁到新办公楼之时，才标志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但是，在莱肯菲尔德大厦里走着时，我仍可以感觉到背信弃义的气氛、追捕的苦楚和杀人的血腥味。

我的欢送宴会平平淡淡。人们说着好话。局长迈克尔·汉利爵士做了一个漂亮的发言。我收到一些惯例卡片，上面都亲笔写着告别的祝愿。保安局内了不起的间谍牵线大师克兰莫里斯勋爵写道，我的离休是一个“伤心而又伤心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是对于机关，但真正受损失的却是我自己。

这天晚上，我在高尔大街办公楼最高层的公寓里过的夜，不时被驶入尤斯顿车站的地铁噪音所吵醒。第二天一大早，我穿上衣服，拎起第一次空空如也的公文箱向正门走去。我向值班警察说了声再见，便跨到外面的街上。我的公事到此结束。一个伤心而又伤心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事情开始于1949年，在那种春天的日子里，却使人想起冬天。小雨击打着预制板制成的实验室的铁皮屋顶。这座实验室座落在埃塞克斯郡的大巴斗镇，我是这里的一名海军科学工作者，隶属于马可尼公司。一台示波仪在眼前跳动着，使人感到头疼。在搁板桌上散乱着一大堆潦潦草草的演算，设计一个能从广袤无垠的汹涌波涛中识别出潜水艇潜望镜的雷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摸索好几年了。电话响了。是我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是马可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迪·布伦德里特要见咱们。”他说。

他要见我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科学署的署长，现在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本人对我们这个研究项目的后一部分一直很感兴趣。对于本项目生产原理系统的拨款一事，要很快做出决定才行。开支将是很庞大的。战后国防研究与财政上的摩擦始终没有间断过。这一次，我准备再与他们争个脸红脖子粗。

我欢迎能有机会与布伦德里特直接谈一谈。他是我家的

老朋友了。战争期间，我和父亲都在英国海军部研究署为他干过事儿。我想，或许有机会找个新活儿干干呢。

第二天，我们冒着不停的小雨驱车来到伦敦，将车停在斯托里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近旁。白厅看起来灰暗而憔悴，那些柱廊和雕塑显得与急剧变化的世界很不般配。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仍然还向人民许愿着什么“牙齿和眼镜”的诺言。但是，去冬是很艰苦的。人们对于定量配给越来越感到不安。1945年胜利的喜悦早已被愠怒所代替了。

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外间，我们向整洁利落的秘书做了自我介绍。这个附属大厅象白厅那样无精打采，里面人声嗡嗡。我们并不是先来的。我跟熟人打招呼，他们都是各单位实验室的科学家。我想，来了这么多人，说不定要开个大型的例会。有二位从未见过的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你们大概是赖特父子吧。”二人中较矮的一位突然说道。他讲话带着简单干脆的军人腔。“我是马尔科姆·卡明上校，国防部办公室的。这是我的同事休·温特博恩。”另一位生人走了过来。“这位是约翰·亨利，外事办公室的一个朋友。”卡明使用着白厅用于区分其秘密公仆的奇怪术语。我想，不管是什么会，但不象是关于反潜艇的战略会。那事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是毫无相关的。布伦德里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请我们进去。

象他的名声一样，他的办公室也很大。巨型格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他的办公桌显得很矮小。他示意让我们坐在会议桌前，桌上整齐地摆着一排吸墨器和细颈水瓶。布伦德里特是位矮小而又精力充沛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挑选的要员骨干之一，与林德曼、蒂扎德和科克罗夫特一起，负责英国的技术和科学，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作为海军部科学研

究署的署长助理和后来的皇家海军科学署的副署长，在战争期间为了将科学家输入到政府部门中来，他是肩负重任的。他并不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但他明白科学家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他的方针就是尽量提拔年轻人，而且因为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信任他，他于是可以得到必要的支持而使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

筋疲力尽的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准备投入一场新的战争——冷战。于是，布伦德里特便首当其冲地被挑选出来，由他组阁，使科学界再度振奋精神，大干一场。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副科学顾问，又于1954年接替了约翰·科克罗夫特的科学顾问、国防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之职。

“先生们，”大家坐下后，布伦德里特开始说，“我认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之中，自从去年柏林事件以来，一直如此。”

布伦德里特对形势分析得很透彻。俄国对柏林和随后对西方空运的封锁使国防观念受到强有力的冲击。

“这场战争要靠间谍，而不是士兵，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他继续说，“我与保安局局长珀西·西利托已经研究了我们所处的地位。说实在的，”他下结论说，“形势不妙。”

布伦德里特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向铁幕后面一帆风顺地派遣间谍已经实际上行不通了，苏联及其盟国意向的情报又十分匮乏，必须靠技术和科学的制先权来填补这个空白。

“这个问题的大概，我已经和你们中的一些人商量过了，有保安局的卡明上校，彼得·狄克逊代表军情六处，我又组建了委员会来评估一下我们的选择，然后立即开始

干。我还建议珀西爵士，由他给我们找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来辅助研究方面的工作。我想介绍一下彼得·赖特，你们有的人可能认识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实验室服务处工作。目前，在我们确定有多少工作可干之前，他将部分地做一些兼职工作。”

布伦德里特朝我这儿看着说，“你干这个，行吗，彼得？”

我还没有回答，他就转向我父亲。“显然我们也要马可尼的帮助，所以，我把你也编到这个委员会了。”（那时，海军里都用马可尼^①的名字来称呼我父亲。）

布伦德里特的典型特点就是这样，提出倡议就象发布命令一样，为了推行自己的那一套，就是将白厅机器扭曲变形他也在所不惜。

下午其余的时间里，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伙计们个个明显地默不作声。我猜想，这可能是秘密公仆们在有外人在场时的一种天性缄默。每个科学家都将自己实验室可能用于情报工作的研究做了即席的概述。显然，对情报工作进行全面的技术性回顾是需要时间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偷听的新技术是急需的。偷听不需要任何入境签证。苏联的保安措施非常严密，得到入境签证要比隔墙偷听或在使馆重建时安装机关更为困难。到喝茶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二十条切实可行的研究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写一份综合评估意见，然后便散了会。

我正要离开时，邮政总局技术部的一个人——叫约翰·

①：马可尼（1874—1937）意大利物理学家，他发展了无线电报技术并成功地创造了远程通讯。1909年获诺贝尔物理奖。——译者注

泰勒，他在会上曾谈了邮政工作监听装置的某些情况——走上前来了作了自我介绍。“在这方面咱俩将共事。”我俩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接着说，“下周我跟你联系。”

在驾车回大巴斗镇的路上，我和父亲一直谈论着这个会议。事情真是难以预料。在战争期间，白厅的行为总是捉摸不定的，而战后却很少那样了。我震惊的是，我已经有了从反潜艇工作中脱逃出来的机会了；而父亲震惊的是，我家45年来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威胁仍然继续着。

我父亲于1912年在大学时就参加了马可尼公司，开始是一名工程师，从事改进探测无线电信号方法的工作。他与H·J·朗德上尉一起，研制成一种真空管接收机，第一次使远程通讯变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正在切姆斯福德的霍尔大街旧马可尼实验室使用这些接收机工作时，突然他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收到的第一批信号交给了马可尼工厂的经理安德鲁·格雷，此人是海军情报部雷吉·霍尔上尉的私人朋友。

霍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局的主要人物，负责从闻名的英国海军部40号房间侦破德国电码。他安排我父亲坐在一辆特许的机车踏板上来利到利物浦车站。他研究完材料后，便坚持让马可尼放我父亲去为海军筹建侦听站和辨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军情报局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及时地探测出德国公海舰队的出海时间，以便驻扎在斯卡帕湾的英国舰队能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局知道，德国舰